

思想者

Thinkers Series ④ 思想者文丛

犹疑不安的岁月·蒋梦麟

清华大学学运史料的几点考证·何炳棣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何兆武

欧洲漫录·徐志摩

从伊斯坦布尔出发·景凯波

林氏家风·林同奇

不为他人·沈睿

爬卡子·英子

关于刘大姐的美好记忆·张耀杰

杨伟名和武文俊·向继东

从一场争论看胡适对苏俄的认识·智效民

沈从文和鲁迅：不该发生的故事·杜素娟

但教莫绝广陵散·赵诚

何康在大陆的最后五十天·王昊

泰山无字碑·范泓

《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序·程卓父

“北洋系”是怎样兴起的·雷颐

遥望冬奥·雒丽萍

何人验得萧红影·桑农

一个世纪的人与事

邵建编 青岛出版社



一个世纪的人与事

邵建 编 青岛出版社

思想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世纪的人与事 / 邵建编.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8.5

(思想者文丛)

ISBN 978-7-5436-4780-0

I. 一… II. 邵… III. ①中国-近代史-史料②中国-
现代史-史料 IV. K250.6 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3098号

书 名 一个世纪的人与事(思想者文丛)

编 者 邵 建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 80998664 传真(0532) 85814750

责任编辑 刘 咏 E-mail: qdliuyong@126.com

特约编辑 贺中原 胡修江

装帧设计 良友书装·李 欣·毛海红

平面制作 杰人平面设计公司

制 版 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640×960mm)

印 张 15.5

字 数 200千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 978-7-5436-4780-0

定 价 26.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电话 0532-80998671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处调换。

电话: (0532) 80998628)

编者的话

“思，思考、思索、思辨。想，梦想、遐想、理想。思想，人类创造与进步的原动力。思想者，人类文明历程的航标灯。”这是我们印在《思想者》第3辑封面上的“题解”，也是召唤着我们的一个理想。思想体现在思想者的言说中，思想的乐趣和思想的沉重同样承载着思想者的多彩人生。本辑《思想者》文丛仍然承续着《思想者》第3辑的编选宗旨：所思所想、所读所感、往事与记忆、人生与现实。不过，相比于《思想者》第3辑三本书中浓郁的文人趣味和书生情怀，为现实的记忆或说个人生命体验的时代烙印成了《思想者》第4辑的主旋律，这种人生记忆与时代风云的相互印刻尤其体现在本辑中的《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和《私人记忆》两书中。

《一个世纪的人与事》（邵建编）是以一个个具体的人与事来映照百年来中国的沧桑风云，其所收入的人，既有蒋梦麟、徐志摩、何炳棣、林同奇等现代中国的指标性人物，也有智效民、程巢父、沈睿、范泓、蒋丽萍等活跃于当代的学者作家。既有人生晚年对扰攘不安岁月的回忆，也有当下对20世纪初的人与事的回顾与解读。譬如蒋丽萍的《遥望冬皇》和桑农的《何人绘得萧红影》，分别通过伶人孟小冬和作家萧红两位拥有不同人生的女性的解读，映照出了那个年代令人感慨万千的故事。而何兆武的《在西南联大的日子》和林同奇的《林氏家风》如同陈列出了独特而丰厚的两个已无法再生的化石标本。

《私人记忆》（张耀杰编）更注重个人的生命烙印，这个生命烙印既有对个人的人生“拐点”的记忆，也有对“他者”对于自己人生意义的记忆，前者如：《年轻的北大教授》（陈翰笙）、《我的抗战生活的回忆》（贾植芳）、《我的1976》（赵世坚）、《我自己的经

历》（谢泳）、《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孙国栋）、《后平房改造风波》（杨支柱）等，后者如：《关于唐达成的回忆》（邢小群）、《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常风）、《我还感觉到他的手温》（钱理群）、《我的朋友史铁生》（徐晓）和《走近胡适先生》（邵建）等。而“父亲”更成了人生成长的一个基点，譬如：《我的农民父亲》（鄢烈山）、《父亲的死与之后的两个月》（迟宇宙）、《我的父亲是个酒鬼》（橡子）等。

邵建的目光投向的是一个世纪，注重的是在岁月中的人生沧桑，他所选择的是能反映世纪背景下的个人故事，如同一幅地图，他贴上去的是一个个驿站的坐标，希望藉着坐标上的人与事，绘出百年来人生地图的细枝末节。而张耀杰的落脚点是指向今天的个人记忆，不管是关于往昔的回忆，还是对亲人师友的缅怀，都指向了一个目标，这就是面对当下的个人生活。温故而知新，这也是《私人记忆》与《一个世纪的人与事》的共同点。

《思想的背影》（王洪波编）在文章的体裁和内容上明显不同于上述两书，但在主题的宗旨上仍属于异曲同工，不过更体现了《思想者》文丛关于“所思所想、所读所感”的追求。与张耀杰、邵建的学者身份相比，作为报人的王洪波更多关注当下的读书界的过眼风云。《思想的背影》一书，系《中华读书报·阅读周刊》所刊文章的精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这也许就是《思想的背影》的特点所在。《重审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关怀》（朱正琳）、《到哪里去找思想呢》（江晓原）、《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命运沉浮》（田布仁）、《“自我颠覆”的晚年梁漱溟》（马勇）、《那些不死的魂灵啊》（迟子建）、《记忆就是财富》（蓝英年）……从这些文章不难看出，虽是所读所感，但更是个人的阅读记忆与印象，所关注的仍是世纪风云下的人与事。

编 者

思想者

- [001] 扰攘不安的岁月·蒋梦麟
- [008] 清华大学学运史料的几点考证·何炳棣
- [024]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何兆武
- [041] 欧游漫录·徐志摩
- [069] 从伊斯坦布尔出发·景凯旋
- [076] 林氏家风·林同奇
- [113] 不为他人·沈 睿
- [128] 爬卡子·英 子
- [136] 关于刘大妮的美好记忆·张耀杰
- [143] 杨伟名和武文俊·向继东
- [149] 从一场争论看胡适对苏俄的认识·智效民
- [174] 沈从文和鲁迅：不该发生的故事·杜素娟
- [179] 但教莫绝广陵散·赵 诚
- [188] 何廉在大陆的最后五十天·王 昊
- [195] 泰山无字碑·范 泓
- [203] 《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序·程巢父
- [214] “北洋系”是怎样兴起的·雷 颐
- [219] 遥望冬皇·蒋丽萍
- [232] 何人绘得萧红影·桑 农

扰攘不安的岁月

蒋梦麟

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 and 知识的土壤上根深蒂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利。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撅起嘴巴、咬牙切齿地随时预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校长赶到现场，告诉他们，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的”规定的人算账。蔡校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

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渐渐散去，他也回到了办公室。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所谓延期，自然是无限延搁。这就是当时全国所知的北大讲义风潮。

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之中有一位高个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一批人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决不会让人认错，他的叫骂声仍旧萦回在我的耳畔。他已经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是位手辣心黑的贪官，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钱。

几年之后，发生了一次反对我自己的风潮，因为我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一群学生关起学校大门，把我关在办公室。胡适之先生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找警察来解围，但是我谢绝了。大门关闭了近两小时。那些下课后要回家的人在里面吵着要出去，在门外准备来上课的人则吵着要进来。群众领袖无法应付他们自己同学的抗议，最后只好打开大门。我走出办公室时，后面跟着一二十人，随跟随骂着。我回过头来时，发现有几个学生紧盯在我背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开除我所能记得的以及后来查出的闹事学生。

好几年以后，我偶然经过昆明中央航空学校的校园。航空学校原来在杭州，战时迁到昆明。忽然一位漂亮的青年军官走到我面前，他向我行过军礼告诉我，他就是被北京大学开除的一位学生。我马上认出他那诚实的面孔和健美的体格。闹学潮时紧追在我背后所表现的那副丑恶的样子已经完全转变了，他的眼睛闪耀着快乐的光辉，唇边荡

漾着笑意。这次邂逅使我们彼此都很高兴。航空学校的校长告诉我，这位青年军官是他们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教官之一。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

学生们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常常是政府无法解决或者未能圆满解决的国际问题，因此，他们常能获得国人的同情；他们的力量也就在此。中日之间的“事件”日渐增多以后，学生的示威游行常常被日本人解释为反日运动。纠纷的根源在于二十一条要求和凡尔赛和约所引起的山东问题。自从远东均势破坏以后，日本几乎享有控制中国的特权。门户开放政策已经取代瓜分中国的政策，但是门户开放政策必须以均势为基础，均势一旦破坏，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任由日本宰割，另一条路就是自我振作，随时随地与日本打个分明。

学生们决定奋起作战，起先是游行、示威、罢课和抵制日货，接着就转而攻击北京政府，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毛病都出在北京政府身上。他们发现没有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国内问题足资攻击时，他们就与学校当局作对。原因在于青年心理上的不稳。一旦他们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时，这种不稳的情绪就爆发了。想压制这种澎湃的情绪是很困难的。

若干学生团体，包括青年共产党员，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劳工运动以及工人的不稳情绪。沿海商埠的工人正蠢蠢欲动。铁路工人和工厂工人已开始骚动，而且蔓延各地。他们不久就与学生携手，参加群众大会和游行。劳工运动是不可轻侮的武器。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曾以总罢工瘫痪香港，使这个英国殖民地在工商业上成为荒漠，历时十八个月之久。

全国性的反英情绪是民国十四年的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五月三十日那一天，一群同情劳工运动的人在上海大马路（南京路）游行示威，公共租界当局竟然下令向群众开枪，好几个人中弹身死，伤

者更不计其数。工人、商人和学生在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之下，随即发动全面罢工、罢市、罢课，上海再度变为死城。六月二十三日，广州的学生、工人、商人和军人继起响应，发动反英示威游行。群众行近沙面租界时，驻防英军又向群众开枪。于是香港各界亦开始罢工、罢市、罢课，使香港也变为死城。北京英国使馆的华籍雇员，在学生煽动之下，也进行同情罢工，致使这批英国外交官员很久都没有厨子和听差侍候。

自从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彼此呼应以后，游行示威者人数动以万计，北京不时有各色人等参加的群众大会出现，街头游行行列常常长达数里，群众手摇旗帜，高呼口号，无不慷慨激昂。一位白俄看到这种情形时，不觉怵然心惊。他曾经在俄国看到不少这样的集会，他说这是革命即将来临的征兆，因此他担心是否能继续在中国平安住下去。

学生们找不到游行示威的机会时，曾经拿学校当局作为斗争的对象，工人的情形亦复如此。他们找不到示威的对象时，就把一股怨气发泄在雇主的身上。不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对付罢工工人，可比对付学生简单多了。他们有时用武力来弹压罢工工人，有时就干脆拿机关枪来扫射。

段祺瑞执政的政府显然认为机关枪是对付一切群众行动的不二法门，因此，在一群学生包围执政府时，段执政就老实不客气下令用机关枪扫射。我在事前曾经得到消息，说政府已经下令，学生如果包围执政府，军队就开枪。因此我警告学生不可冒险，并设法阻止他们参加；但是他们已经在校内列队集合，准备出发，结果不肯听我的劝告。他们一到了执政府，子弹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他们头上了。

我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得到发生惨剧的消息后马上赶到出事地点。段执政官邸门前的广场上，男女学生伤亡枕藉，连伤者与死者都难辨别。救护车来了以后，把所有留着一口气的全部运走，最后留下二十多具死尸，仍旧躺在地上。许多重伤的在送医院的途中死去，更有许多人则在手术台上断了气。我们向各医院调查之后，发现死伤人数当

在一百以上。这个数目还不包括经包扎后即行回家的人在内。

段祺瑞政府的这种行动，引起全国普遍的抗议，段政府后来终于垮台，此为原因之一。

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谈到的原因之外，另一原因是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付桀骜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子女的行为偏偏又受到邻居们的支持，工人们的情形可就不同了；他们的父母或亲戚，既不是政府大员，也不是社会闻人，因此他们命中注定要挨警察的皮鞭或军队的刺刀。只有在学生领导之下，或者与学生合作时，工人才能表现较大的力量。

学生运动在校内享有教师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国民党党员和共产党党员的支持，因此势力更见强大。此外还牵涉到其他的政治势力。故而情形越来越复杂，声势也愈来愈浩大。学生运动自民国八年开始以来，背后一直有教员在支持，就是满清时代的首次学潮，也是有教员支持的。

后来教员也发生罢教事件，要求北京政府发放欠薪，情势更趋复杂。北大以及其他七个国立大专学校的教员，一直不能按时领到薪水。他们常常两三个月才能领到半个月的薪俸。他们一罢课，通常可以从教育部挤出半个月至一个月的薪水。

有一次，好几百位教员在大群学生簇拥之下，占据了整个教育部的办公厅，要求发给欠薪。八个国立学校的校长也到了教育部，担任居间调停的工作。教员与学生联合起来，强迫马邻翼教育次长和八位校长一齐前往总统府，要求发薪水。这位次长走到教育部门口时，借口天在下雨，不肯继续往外走。一位走在他旁边的学生汪翰，马上把自己的雨伞打开递给他，并且很直率地说：“喏，这把雨伞你拿去！”于是这位次长只好无可奈何地继续前进，后面跟着八位心里同样不怎么乐意的校长。群众走近总统府时，宪兵、警察赶紧关起大门。教员与学生在门外吵着要进去。忽然大门打开了，大群武装宪警

蜂拥而出，刺刀乱刺，枪把乱劈。上了年纪的教员和年轻的女学生纷纷跌到沟里，有的满身泥泞，有的一脸血迹，叫的叫，哭的哭，乱成一片。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侮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了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这位马教授后来被送到法国医院诊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长的要员前往慰问并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马教授的老母说：

“这孩子是我的独子，政府几乎要他的命，请问这是什么道理？”

曾任省长的那位要员回答道：“老伯母请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这位老弟的相貌，红光焕发，前途必有一步大运。老伯母福寿无疆，只管放心就是。至于那些无知士兵无法无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

老太太居然被哄得安静下来，病房里其余的人却几乎笑出声来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其他教员，也都因为这位要员的风趣而面露笑容。

这个事件总算这样过去了。另有一次，教员们拥到财政部要求发放欠薪，部里的人一个个从后门溜走，结果留下一所空房子。有一次学生们因为不满政府应付某一强国的外交政策，冲进外交部打烂一面大镜和好些精致的座椅。学生、教员和工人联合起来罢工罢课，反对北京政府和侵略中国权益的列强。多事的那几年里，差不多没有一个月不发生一两次风潮，不是罢课就是罢工。

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

我讲这些话，绝不是开玩笑。我记下这些往事以后，又做了场恶

梦，有时看到青年男女横尸北京街头，有时又看到宪兵包围北京大学要求交出群众领袖。梦中惊醒之后，辗转反侧无法安枕，一闭上眼睛，一幕幕的悲剧就重新出现。

有一天，我和一位老教授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柏树下喝茶。这位老教授曾经说过一段话，颇足代表当时扰攘不安的情形。

“这里闹风潮，那里闹风潮，到处闹风潮——昨天罢课，今天罢工，明天罢市，天天罢、罢、罢。校长先生，你预备怎么办？这情形究竟到哪一天才结束？有人说，新的精神已经诞生，但是我说，旧日安宁的精神倒真是死了！”

清华大学学运史料的几点考证

何炳棣

我在北平清华的三整学年(1934~1937)确是非常专心用功的三年；尽可能挖出自修的时间仍感不足，又怎愿分神于政治运动呢？在不满百年的人生中，但愿能有三四年短暂的机会完全钻进象牙之塔，却因国难之日益加深而无法全部实现。

1934年秋刚刚开学不久，我级就有一批同学从事于竞选、力求操纵学生自治会及其他大小社团。我的政策是全力读书，不管“闲”事，可是自始即观察到这些政治活跃的本级同学中确不乏真正干才。我1932年底被南开开除几月之后，即在北平由南开同班、初中时田径密友长沙周永升介绍认识了黄诚。黄手笔快、口才好，其抗强权反礼俗的性格已部分地反映于他和一位湘籍有夫少妇真正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以补偿他对家庭安排的婚姻的不满。我曾不止一次见过这位少妇，现已忘其姓名，可能是周的本家或亲戚(黄诚最后以中共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身份被国民党顾祝同部队俘虏，1942年春不屈而死。本文特别述及黄诚青壮年韵事以备编撰中共烈士史传者参考)。和黄诚在一起的吴承明也是1933年春即在北平认识的。我自始即认为吴是清华十级头脑最清楚、分析能力最强的级友之一。

当时政治活跃的同班同学中，姚克广(依林)给我的印象最深。他

不但在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中成绩优异，并在1934年秋全校举办的英语背诵比赛中荣获第一名。虽是背诵，文稿是必须事前自己亲撰的。第一名的英文水平最具体的计量尺度是何人第二。第二名是政治系研究生、燕京大学毕业的网球队长罗孝超。罗系出福州外交名门，他的祖父罗逢祿是李鸿章极赏识的外交干才，驻英钦差大臣(即全权公使)。罗孝超的父亲也是驻英外交官，罗的小学教育是在伦敦完成的。而姚克广仅仅是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毕业、将满十七足岁的大一新生。这一项从未见于大陆任何公私有关姚依林的资料，我在1994年底委托国务院办公厅转致姚依林家属的吊唁信中首次追忆的。

我们十级最大的特色是自始即表现出特别强的政治活动能力。表现政治活动能力的头一个对象是反抗“拖尸”(toss)运动。“拖尸”是引进已久的美国大学本科陋习，高年级学生对一年级新生半游戏、半污辱性的人身“虐待”。已故级友居浩然(1917~1983)，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之子，一位极锐敏的政治观察家。有以下的追忆：

.....就在反“拖尸”运动的号召下组成[十级]级会，由此领袖人才纷纷脱颖而出。入校不到三个月，已进而问鼎全校性的学生自治会。若在往年，这无异痴心妄想。因为学生自治会的控制权一直操在三四年级老大哥手中。就是一年媳妇熬成婆的九级，也只能在外围摇旗呐喊。到了我们十级，天下大变。一年级时“新鲜人”(freshmen)已活跃大礼堂，二年级开始，大礼堂讲台上主席团的成员十级占半数以上。就中如黄诚、吴承明、姚克广诸拔尖人物，头脑之清楚，反应之敏捷，辞锋之锐利，往往使老大哥相形见绌。1935秋.....黄诚已经是名至实归的清华学生会主席，也因此当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天安门大会的总主席。

《清华大学十级(1938)毕业50周年纪念特刊》(台北，1978)

由于与黄、吴考清华前已认识，姚的才干和英文令人钦佩，反“拖尸”又是正义运动，有助于建立十级的尊严，更由于我正在力求

实践“扎硬寨、打死仗”的读书原则，所以整个第一学年竟能不过问校内政治，在磨炼一己意志之中“平静”地度过。这并不是说我当时对左派同学竞选拉票的手段和制造“紊乱”的用心都无异议的。

我之卷入政治斗争是因为“一二·九”、“一二·一六”以后两个月间左派领导的请愿、罢课、罢考，尤其是1936年2月20日下午教授会在科学馆三楼大教室“讨论补行上学期考试问题时，有学生多人声称代表全体学生，在外高呼口号，要求免考，继复包围会场，并有代表数人冲入”（《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以致引起在校总共七十四位教授中六十八位教授签名发表辞职宣言。这天晚上我们不少埋头读书的同学就在同方部（早期所建的小礼堂）开会，商讨如何组织起来，对抗救国会持续破坏校规秩序的策略。居浩然回忆中的观察是正确的：

“一二·一六”大示威后，清华学生内部发生分裂。主流是救国会派，控制学生代表会干事会，对外代表全体。反主流是同方部派，人数号称三百，实只百余，对外限于个人活动。就我回忆所及，我们被称为“同方派”的原是毫无组织经验的乌合之众。内中虽有国民党同学六七人，除一人是江苏籍外，其余都是东北逃亡入关，历经千辛万苦考进清华的，平时不得不用功，也不得不遵守清华良好的政治传统的（内中包括标枪国手彭永馨）。所以复课之后，同方派等于不存在，大家都回到读书岗位。西安事变狂飙袭来之前的九个半月竟是我吸收知识最大量最多样的“黄金月”！

西安事变才把我重新卷入校内政治斗争，而且我的“事迹”已载于199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之中。我先将这项关乎我而细节有待详考的“当时叙事”全文照录如下：

救国会委员黄绍湘述二十五日学生会被捣毁的经过——二十五日晚刘安义、何炳棣等聚众三十余人捣毁学生会所，我当时在场，并且

是何、刘等攻击的目标之一。为使同学更明了事实真相，谨述当时情形如下：

九点多钟的时候，我正在楼下，和许多人谈这次西安事件的解决，亏得迅速，不致涂炭生灵等话，听见楼上救国会发出叫“打，打”和其他吵闹的声音。正在不得其解，楼上跑下一个同学说：“王达仁被包围了，最好请人出来排解排解。”宋士英君、唐宝鑫君听见这话，连忙跑上楼，我也随着上楼。

代表会主席王达仁君正在写当天代表会布告，手里还拿着一杆笔，态度很镇静，很诚恳，屋子塞满了人，一个个骄横满面，气势汹汹。

“王达仁，你叫的口号问过谁的同意？”

“时间太匆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王君说。据事后问王君，这些同学先跑到王君房间，准备将王君毒打一番，王君不在，因此来到学生会，王君第一句话就问：“听说你们要打我，我想不会。”因此见面不容分说的毒打没有举行。

“你为什么不征求我们同意？”

“你有什么权利乱定口号？”

“打打”之声又起来了。

王君说：“请安静！诸位同学有话尽可说。”

“你准知道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吗？蒋委员长虽被放出，但中央并不满足，也许还继续讨伐哩！不根据事实你就叫口号。”许多人的声音。

“这是我的错，但是我觉得中央不会的，蒋委员长已经出来，张学良下野，不是可以和平解决了吗？”王君委婉地解释。

“不通！不通！”

“王达仁，你简直没有国家观念，明明有中华民国，你不叫中华民国万岁，而叫中华民族万岁。没有民国，怎么有中华民族万岁！”说这句的人是刘安义。

王君又解释。屋里是一片乱糟糟，有几个人跑去把报夹子拆散，